

祝灵君 李正奎/著

小村政事

一个基层党支部的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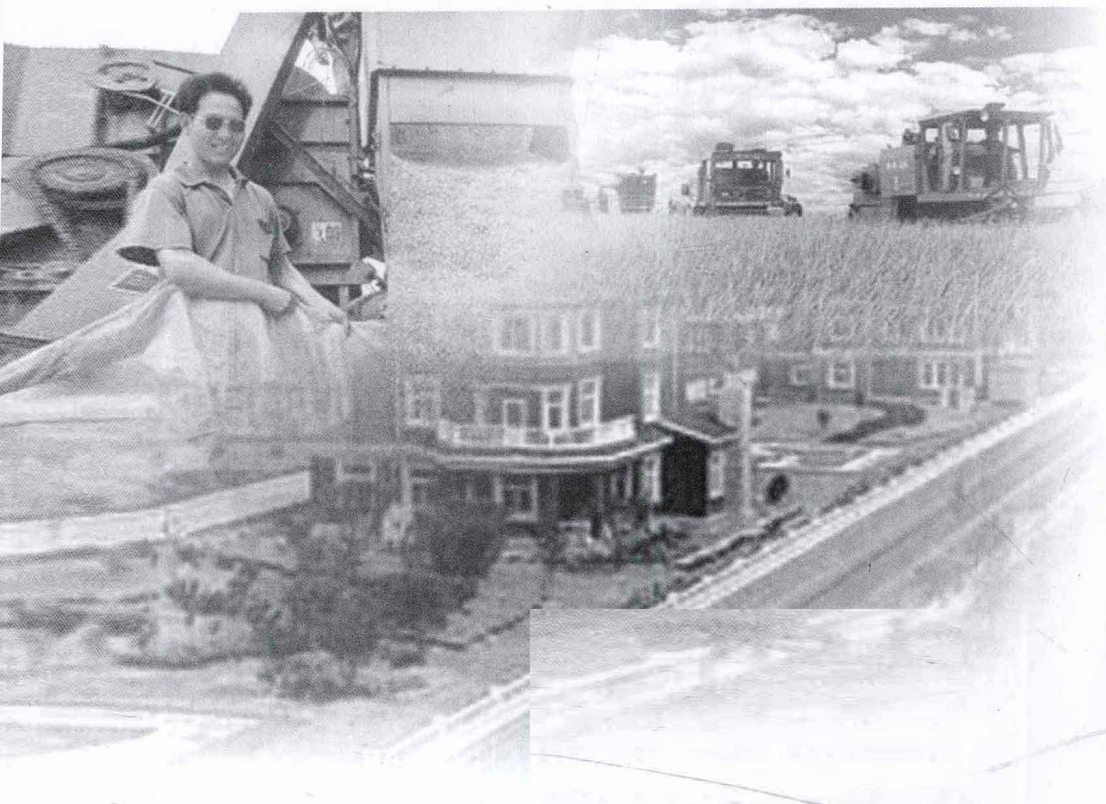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祝灵君 李正奎/著

小树做事

一个基层党支部的实例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张克敏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马 晶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村政事：一个基层党支部的实例/祝灵君，李正奎
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35-4074-5

I. 小… II. ①祝…②李… III. ①乡村-改革开放-
成就-南江县②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党的建设-
概况-南江县 IV. F327.714 D2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1545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A5 印张：17.25

字数：243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9.00 元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对这30年进行全面总结和系统回顾，既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这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党的建设领域也不例外。大量的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建设的论文和书籍已经或正在被生产出来，造成了相当的气势。对这种状况表示充分肯定之余，我有一点期望，就是期望这种总结和回顾能够有更高的眼界和更深的洞察，能够为进一步的党的建设提供更加深刻的思考。这点期望，并非没有理由。在党的建设领域，文章相对最好写，因为现实中可资利用的中央和地方的文献、他人的著述乃至现成的话语都汗牛充栋，俯拾即是。同时，党建的东西又最难写，因为想摆脱固定的话语体系，讲点新话，拓展一个新的角度，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党建的研究产品往往是以量取胜，而富有学术含量者却比例不高。怎样提高学术含量、写出新意，是相关研究者都关注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祝灵君博士给我送来了这部书的书稿，请我指点。这是一部让人眼睛一亮的书。

我向来以为，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党的建设（我通常已经把它拓宽到政党政治）需要从基本理论和

实证两个方面强化研究。前一项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必说，仅仅因为过去对党的问题多为特殊经验总结而缺乏从一般规律把握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基本理论研究的极端必要性。后一项研究，倒是更值得多讲几句。或许有人觉得，既然过去以经验研究为主，那必定注重实证研究。这样一来，强化实证研究的主张岂非无的放矢、画蛇添足？其实不然。虽然我们研究的眼界局限于经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是把过去的经验变成了一套一成不变的话语，甚至变成教条，当发展着的实践和这些教条发生矛盾时，不是依据实践的发展来调整理论、进行创新，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实际生活往这些教条和话语体系里面装，使得理论成了实践的羁绊。严格说来，这已经不是“研究”，而只是一种简单的、主观臆断式的图解。所以，实事求是地看，在党的建设研究领域，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其实也是缺乏的。使我感到兴奋的是，近年来，我们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的一些年轻人在拥有扎实理论基础的同时，也纷纷投入实证研究。这种努力，正在结出可喜的成果。祝灵君博士的这本书，便是其中之一。

在我看来，这项成果有几个非常值得倡导的突出优点。

一是深入扎实。该书把研究对象锁定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上，抓住其中一个案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全方位的研究。论述农村基层党的建设文章很多，但对一个村支部长期跟踪观察，拿出“解剖麻雀”的功夫深入其中，尔后把“叙事”与“说理”、“宏观”与“微观”巧妙地结合起来，把这只“麻雀”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没有一股沉下心来、扎扎实实的精神是

很难做到的。在如今普遍学风浮躁、急于求成心态大行其道的环境下，做到这一点更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人，祝灵君博士这样去做并且做到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值得每个研究者效法。

二是以小见大。当一项研究涉及到30年的跨度时，人们会想当然地认定它的宏观和博大，而宏观和博大往往难免空洞。但是，本书虽然着眼3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却从微观入手，从一个村和它的党支部入手，以摆故事讲道理的方式，让人们从这样一个微观得不能再微观、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对象的历史变迁中，读出中国农村党的建设30年变革的大趋势，不但克服了宏观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与微观实际相脱节的弊端，而且把它与整个中国的改革联系起来，勾勒出一幅生动活泼的基层党的建设的图景。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

三是方法新颖。一讲到有关党建研究方面的成果，人们通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和枯燥乏味、千篇空话联系在一起。这固然有人们认识不全面的一面，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研究者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话语定势和方法论定势带来的。习以为常的大话、官话、空话和文件语言，往往使大多数人还未及了解内容就心生反感，更不要说研读和思考了。因此，如何摆脱这种令人望而生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可憎面孔，是党的建设研究应当下大力气去解决的重大课题。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这种努力和探索。作者把黄金村党支部日常发生的故事集在一起，娓娓道来而不重复，在有极强的可读性的同时而又不乏深刻思考。这种探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四是思路独到。本书研究的是农村，但和其他研究农村的社会学著作又有所不同。在我国，比较流行的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解读中国社会的方法。但是，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面前，这种解读有时会显得解释力不足。比如，“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近年来人们研究中国乡村政治时比较喜欢使用的模型。然而，用这个模型却很难准确解释党的基层支部、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村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我比较赞同作者在本书提出的一个观点，即：中国政治实践中“党群互动”远比“国家与社会”互动真实得多。无庸说，这是作者以现实主义态度研究中国政治得出的结论。

说了以上一些赞许的话，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已经是一部很成熟的著作了。相反，作为一种尝试，其不足也在所难免。我只是觉得，对于年轻人的这种探索，应当更多地予以鼓励，才能使创新之芽茁壮成长。这种创新对于执政党的建设研究尤为珍贵，也尤需保护。祝灵君博士是我部青年教师，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毕业以后来到我部工作，他喜欢思考问题，有自己的见解，这几年在学术、科研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成果。李正奎同志是中共四川南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行政事务缠身，依然腾出时间，参与到这种尝试中，实在难得。他们的研究干劲和开拓精神令人鼓舞。由衷希望更多的党建研究者拿出这种干劲和精神，共同推动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王 长 江

2008年10月于中共中央党校

自序

1978年12月，中国农村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12月18—2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大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已基本完成，全党的工作重点开始从阶级斗争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大会同时确定了一贯“左”倾的农村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①；二是发生在12月下旬的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户农民（包括2名单身）神色庄严地签订一纸分田到户的契约^②，从此掀开了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篇章。

中国乡村经济体制的新变化促进了乡村两级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的变化，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乡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乡镇企业的壮大。乡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调整和互动展示了30年来中国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巨大变迁图景。在这幅变迁的画卷中，有一个核心要素，即中共的基层组织：村支部。村支部被中共誉为乡村社会的“战斗堡垒”，在中共高层眼中的地位与价值超乎平常人的想象^③。因而，观察一个中共基层支部多年的发展变迁就很有价值：一方面，中国的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彼此相连，具有体制和信息传输的连贯性，可以从一端观察另外一端，可以通过解剖微观案例观察中国政治的大图景；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在中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观察其基层组织的日常活动，就扭住了中国基层政治发展中的“牛鼻子”。正因为如此，我们以著作的形式主

① 比如，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对“农业学大寨”的“左”的口号一字不提，强调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强调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报告还提出了支持社队工商业大发展的政策，改变了过去认为农村社队发展工商业是不务正业的看法，等等。

② 契约内容如下：“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小孩养活到18岁。”该契约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号：GB54563。

③ 在中共的执政优势中，人民军队和党的基层组织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团结的两大支柱性力量。江泽民多次提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反复强调必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2008年2月18日，胡锦涛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始终不能放松。”

要记录了一个村支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历程。村庄的舞台虽小，却展示了党的建设的大画卷。

本书一改以往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研究风格，以语言的通俗化和故事的本原化为主，以学术论证的逻辑化和缜密化为辅，在微观中显示宏观，在“叙事”中显示“论事”，在简单中显示复杂，在活泼中显示严肃。由于村支部活跃于村庄背景下，因此，也就有必要回顾学界关于村庄研究的主要文献。

一、境内外学者对中国村庄的研究

（一）境外学者的研究

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的学者来讲，有关村庄研究的文献数不胜数。但是专门对村庄的核心领导力量——村支部的研究却寥若晨星。从境外学者的研究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里仅列举其中的代表性文献：

1. 对解放前的村庄研究

威廉·韩丁在其《翻身》一书中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讲述了山西省潞城县张庄（在其英文著作中，将“张”拆分为“长弓”，故称为“长弓村”）党组织成立以及党组织领导土地改革和党组织整顿的过程。发动党员入党是一件秘密的工作，村里的地下党员张天明经过试探、接触、了解、考察等程序吸收了全村30多个农民入党，其中有7名妇女。在张庄党支部成员中，80%是无地少地的贫雇农，20%是自耕农，无地主和产业工人。通过成立党组织，村公所、民兵、妇女会、农会等被联结起来，党组织成为张庄“土改”的领导力量^①。50—70年代，柯鲁克夫妇出版了关于太行山区十里店的几本著作，其中《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1959），讲述了十里店从1937年到1947年所经历的土地改革过程；《十里

①〔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柯鲁克夫妇于1948年2月至5月在十里店目睹土改复查、整党和民主选举的过程。这两部著作都涉及到基层党组织活动的情况^①。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对河北饶阳五公村进行了调查，以其领头人耿长锁的生活轨迹为线索，深入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1960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作者分析了减租减息、互助组、合作社以及大跃进时的人民公社等改革运动，这些改革对农村社会及农民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战争及国家建设的作用，它们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进而探讨国家与社会，国家领导与地方干部的关系^②。美国学者杜赞奇利用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通过“中国农村惯性调查”收集的田野资料撰写了《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该书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与村庄的关系，作者深刻地分析了国家政权如何在乡村社会被内卷化（involution）的现象。^③

2. 对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村庄研究

50—70年代，柯鲁克夫妇仍以十里店为研究对象，在其《阳邑公社的头几年》中讲述了十里店地区所展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④；1959年杨庆堃以广州鹭江村为调查对象，写出了《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56年，W.R.葛迪斯到费孝通所调研的江村，对开弦弓村进行了社会调查，分析该村的革命前后的巨大社会变化，写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这两本书都涉及到中共的基层党组织在领导基层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具体活动。1980年代初，美国学者威廉·韩丁对张庄再次进行了调查，出版了《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又称为《为公》）一书，对张庄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追踪分析。1984年，陈佩华（Anita Chan）、马

① 转引自胡宗泽：《华北地区权力的变迁：1937—1948年十里店资料再分析》，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美]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内卷化”（involution）一词是杜赞奇借用吉尔兹的概念。在研究爪哇农业的过程中，吉尔兹描述了该地农业发展中出现的停滞现象。“内卷化”用来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并定型以后，很难继续发展或难以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只能不断简单再生产和不断重复。杜赞奇利用“内卷化”一词来形容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如何被乡村恶棍、痞子等代理人所把持，形成了一种“保护型经纪人”或“赢利型经纪人”的现象，因而国家形象大打折扣，国家在乡村社会开始丧失“合法性”，却难以找到一种建立新的合法性源泉的途径。[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转引自胡宗泽：《华北地区权力的变迁：1937—1948年十里店资料再分析》，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① 转引自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②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改革》，三联书店2002年版。

德森 (Richard Madsen)、安戈 (Jonathan Unger) 根据他们于1975—1978年对移居香港的广州陈村村民的多次访谈而出版了《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一书，对陈村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考察，也包括党的基层组织活跃的基本情况。对于陈村的研究，稍后几年还出版了一些其他研究作品。如1984年马德森出版的《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与权力》，该书分析了传统的儒教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在陈村的互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之间的潜在冲突与紧张。在这种互动之中，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出现了新型的农村精英，如共产主义士绅、共产主义起义者、道德主义革命者、实用主义技术官僚等四种，同时把他们归结为两种类别，即：适应社区道德期望的和适应国家道德期望的两类精英^①。黄树民在其《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中，以叶文德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人生经历为线索，揭示了福建林村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是如何改造乡村政治文化。黄认为，“一种全国性文化明显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慢慢被中央政府所主导的大众文化取代。”^②

3. 对改革开放后的村庄研究

20世纪90年代，黄宗智以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独特规律，批评了把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思路。黄宗智提出了一个“过密型商品化”的概念，指出了中国农村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商品化过程。这种过密型的商品化过程不仅没有使小农经济解体，反而强化了小农经济的运行基础。因此，几百年的中国农业只有增长却没有发展。而1979年后的农村改革成功地突破了“过密型增长”

的发展模式，走上了一条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发展道路。^①

1989年，陈佩华（Anita Chan）、马德森（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第一次前往陈村做实地考察，补写了1981年后陈村的变迁。1992年，他们推出了《当代中国农村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一书的增订本，全面翔实地展现了一个华南农村近30年来的沧桑史。^②

（二）境内学者的研究

境内学者对村庄的研究文献很多。20世纪上半叶，境内出现了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村庄研究文献，他们大都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切入，以研究村庄社会中的风土、人情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如1925年上海沪江大学教授D. H. 库尔普出版的以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为基础的《华南乡村生活》；1929年，李景汉出版的以北京京郊挂田屯等四村160户家庭调查为基础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35年，林耀华出版的以福州义序调查为基础的《义序的宗族研究》。1948年又出版了以福建玉田县黄村调查为基础的《金翼》等^③。在早期的研究中，不能不提费孝通在1939年出版的以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调查为基础的《江村经济》，该书通过对“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论述，“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④，深入分析国家影响基层村庄和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国家对村庄采取了“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的现代化战略。

自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已经缺失，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9年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务虚工作会议上提出社会科学要“赶快补课”^⑤，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才迎来春天，村庄研究也是如此。在80年代短暂的能

①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② [美]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陈村的故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转引自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④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⑤ 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国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我们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国外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比国外落后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181页。

量积聚之后，学界基本掌握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开始大胆探索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研究道路。在这种背景下，村庄研究（或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很自然地成为学界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目标的一个途径。90年代以来，有关村庄和村民自治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根据中国期刊网1979—2008年所发表的文章统计，用“村庄”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一共有10648篇文章。以“村民自治”为关键词搜索共有8031篇文章；在北大图书馆藏书中，以“村庄研究”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到31本出版物；而以“村民自治”为关键词搜索，则高达86本。

在众多的“村庄研究”或“村民自治”研究的文献中，有一些著作是有代表意义的。如王沪宁199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1997年，王铭铭以福建安溪美法村为研究对象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该书以“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深入研究了溪村陈氏家族在明初以来600多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演变，通过家族社区变迁的历史重现了国家与村庄互动的历程；1997年，折晓叶出版了《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以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万丰村为研究对象，在乡镇企业兴起和农民普遍外出流动的大背景下，描述了中国农村非农化的社会变迁过程；1998年，张乐天出版了《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以浙北联民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联民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村落传统如何遭受到外部力量冲击，人民公社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乡村传统的村落文化；1999年，李书磊在其《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以村小学作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在村落背景下的国家与村庄互动的过程，为乡村公民社会研究或“第三部门”研究提供了一个典

范；2000年，庄孔邵在跟踪调查林耀华研究过的金翼黄村的基础上出版了《银翅：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一书，展现了黄村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以及文化传承的问题。除了上述文献外，有关村庄的研究还有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1997），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2000），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合著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等。

在—批年轻学者中，最近几年也出现了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的博士论文《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研究》（2001），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2002），项继权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2002）等。

（三）主要特点

境内外学者对中国村庄研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从人类学或社会学角度展开。许多学者都采用社会学的“叙事”方法对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文化构成进行深入分析，展示了乡村社会的图景与全貌。采用这种角度的研究一般时间跨度比较长，长则纵横整个20世纪，短则几十年；二是分析框架大都受“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影响^①。之所以受这个框架的影响，一则是因为现代化过程的—主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中国村庄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二是没有—个更好的分析框架出现。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出现了两派不同的观点：—派认为，早期中国村庄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局面，以共同推进

① 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中，何汉理(Hary Harding)等学者认为，第一代学者(受冷战和对苏联研究的影响)使用全能主义模型，而第二代学者(受“文革”以及美国经验的影响)使用各种版本的多元主义模型，第三代学者(80年代以来)受欧洲经验的影响则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型。Hary 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No. 36, pp. 284—307, January 1984; Elizabeth Perry,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pp. 704—713, *The China Quarterly*, 1994.

① 参见: Elizabeth VanderVen, "Village-State Cooperation: Modern 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ir Funding, Haicheng County, Fengtian, 1905—1931", *Modern China*, Vol. 31, No. 2, April 2005, pp204—235.

② “熟人社会”这个词最早是费孝通针对齐美尔的“陌生人”的概念提出来的,“陌生人”主要是指在工业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而“熟人社会”主要是指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半熟人社会”是国内学者在分析行政村中人与人关系时使用的一个概念。参见贺学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贺学峰:《半熟人社会》,《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③ 比如有学者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对乡村研究的生命力和运用范围的广泛性。“从目前状况看,以这一研究框架为背景的村庄变迁研究还远未结束,这不仅是因为已有的研究远未能穷尽问题,也是因为有的研究也并不能使人满意。”参见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④ Perry, Elizabeth J., 1994,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 & Society Relation*, in *The China Quarterly*, ISS No. 139.

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例如,国外有学者对1905—1931年的奉天省海城县某乡村的研究发现,在早期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与农民合作推动了乡村现代小学的建设。农民志愿响应政府号召,以创新、合作的态度,建立了几百所小学。政府提供部分资金,乡村提供公共土地,乡绅个人提供捐助,出现了难得的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局面。^①

还有一派认为,国家的强力介入改变了乡村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出现了两种结局:一是以杜赞奇为代表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乡村社会出现了“国家合法性丧失”的局面;另一种则很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力量的介入推动了中国乡村变迁的“有计划性”。

90年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在国内发展出了许多更具中国元素的分析视角,如“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等^②,一些学者并不认为“国家与社会”模型已经过时^③。但是模型取向本身是有缺陷的:第一,模型取向虽然有利于人们从复杂的政治现象中抓住本质,使复杂现象简单化,但却有可能凝固人们的思维,留下曲解、误导乃至无知的遗憾,这也是导致境外学者对中国政治判断失误的原由;第二,把乡村政治看作是模型理论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例如,境外学者喜欢从社会科学领域中尤其是以从西方民主国家提炼出来的理论来剪裁、判断中国政治。这个缺陷,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深有体会。比如,裴鲁恂提出,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应该由一个“消费领域”(使用从其他国家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变成“生产领域”(能够产生一些令比较学者感兴趣的某些原始理论或概念)^④;第三,西方假设与东方文化的微妙差异性。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有一种“美国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情结,当这些学者研究其他国家时,其依据往往是清一色的西方标准,并常常排除了该国文

化差异等因素,致使结论与现实相悖。此外,国外许多学者在使用“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时,常常把二者都看作一个整体,缺少对各自内部因素的动态分析。^①

而在国内学者的村庄政治研究中,往往还忽略一个最基本的视角:执政党的基层组织与群众的互动,亦即“党群关系”的分析视角。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比较,该视角具有四个特点:第一,从话语符号上看,它是中国式的;第二,从政治现实看,政党与群众的互动是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替代形式;第三,它体现了执政党最主要的执政思维,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执政党的根本目标;第四,与其他模型相比较,党群关系更具有包容性^②。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本书选择以村支部与群众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

二、为什么研究黄金村党支部

(一) 为什么研究村支部

长期以来,我有一个判断: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乡村场域^③中“国家与社会”互动是依靠中共的基层支部来维持的。中共基层支部由于是执政党组织的一部分,而天然享有国家权力的身份,可以合法代表和执行国家意志;但是,村支部也拥有“社会”的身份,在大多数时间里,村支部成员并不是从场域外嵌入(embedding)的,支部成员大都生于本村、长于本村,和本村的乡里乡亲一道构成了“熟人社会”,属于“社会”的组成部分,于是就有了在本乡本土中不同于国家但却非常现实的利益诉求。因而,对村庄政治的研究,应该抓住关键角色,村支部的特殊角色使它具有了观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禀赋。

从当前研究现状看,与“村庄研究”、“村民自治”研究相比,对村支部的研究远远滞后,也要

① 例如国外学者在使用“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来分析中国乡村政治时,往往把二者均看作一个整体,缺少对各自内部权力分布以及互动的动态分析。参见 Daniel Kelliher, *Peasant Power in China: The Era of Rural Reform, 1979—198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s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Dorothy J. Solinge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ing Reforms* (Armonk: M. E. Sharpe, 1993)等文献。

②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参见祝灵君:《党群关系: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另一种视角》,《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祝灵君:《一致与冲突: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再思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场域(arena)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P. Bourdieu)提出的,是为了克服“国家”、“社会”的概念的空泛和彼此的对立。“场域”既可以是地理上的(如村庄、乡镇、县甚至国家),也可以是功能上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还可以包括构成此一场域成员的价值观念、文化象征和资源的集合。转引自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注释22。本书中的“场域”仅指村庄成员生活的地点、环境、社会舞台和社会空间。

“冷门”得多。比如，以“村支部”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发现1979—2008年共发表文章800篇，明显少于以“村庄”为关键词的10648篇，和以“村民自治”为关键词的8031篇。从大多数村支部的研究论文看，主要有几个研究视角：一是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展示了当前村级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思考，这方面的文章比较多；二是从村民自治角度来分析“两委”关系；三是从乡村社会利益分化的角度来分析村支部的转型；四是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角度来分析当前村级组织建设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等。

而以“村支部”为关键词在北大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中仅搜到两本著作，一本是由中共福建省东歧村支部、村民委员会编的《东歧村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另一本则是描写村庄生活的小说。尽管许多村庄研究或村民自治研究的文献都涉及到村支部，如探讨“两委关系”等，但村支部大都以“背景”角色出现，缺少对其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除研究现状的诱惑外，工作经历和学习兴趣也给我增添了研究村支部的动力。1999年，我到四川省委党校党建部工作，开始对乡村政治产生了兴趣，产生了观察一个村支部多年发展历程的想法。2001年，我来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师从王浦劬教授，攻读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学位。在校期间，受老师的感染，更强化了对本土化的中国政治研究道路的执着，开始关注乡镇政治。2003年，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在时隔4年后再次回到南江县，对几个乡镇进行调研。调研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基层支部的情况，获得大量一手材料。

2004年，我到了中央党校党建部工作。在这里，可谓云集了全国党校系统顶尖的党建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结合自己的